

中国现代小说作家与孝文化的人格取向

胡用琼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孝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其中不乏偏激否定。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等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反传统却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精神层面与实际行为上常常会有两种文化力量的对立冲突,从而影响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价值取向,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人格。传统孝文化既包含了亲亲之情的孝道,同时也包含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孝道。文化的复杂性和作家文化选择的主体性也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的文化人格。

[关键词] 孝文化; 小说作家; 情孝冲突; 非孝意识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6-0097-05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100

“人格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人格”^{[1][11]},文化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孝文化是传统文化核心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孝道一直为儒家思想所尊崇,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铭刻着炎黄子孙古已有之的传统美德。”^[2]梁漱溟甚至认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3]。从文化与人格取向关系来看,文化对人格具有塑造作用,人格是文化的产物。孝文化是影响作家传统文化人格的重要因素。孝文化形成的文化人格是把孝内化成个体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带有先天性和潜在可能性。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后文称现代小说作家)几乎都生活在以“孝文化”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中,他们处在新旧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的复杂性和作家文化选择的主体性决定了作家孝文化人格的丰富性。

一 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

人格作为个体独特心理品质或性格特征,是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文化密切相关的。“人格是个体在先天生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4]。文化是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个体人格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是一种文化的产物。”^{[1][8-9]}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影响并决定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塑造。孝文化对现代小说作家人格取向

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具体表现为思想上批判孝文化,而在行为方式上难以摆脱孝文化的束缚,从而表现为内在的文化认同与外在行为方式的矛盾人格。五四初期的现代小说作家在旧学中启蒙,他们有着深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旧学根基,在旧式教育中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传统文化人格。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他们大多数获得官费资助出洋留学,在国外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器物与技术,而是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深深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孝文化某些方面的腐朽与落后,并逐渐形成了现代文化人格。传统文化人格与现代文化人格在现代小说作家身上形成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现代文化人格促使现代小说作家批判孝文化的腐朽与没落,而传统文化人格中不合时宜的成分由于文化先天性、遗传性、稳定性一时难以根除,从而形成一股潜在的力量,影响并制约着个体行为模式。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先驱首当其冲地批判孝文化的专制与腐朽,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主张孝弟,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乎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5]吴虞批判了传统孝文化影响下的卑幼人

[收稿日期] 2020-06-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现代小说对传统孝道的多重表现”资助(编号:16C1417)。

[作者简介] 胡用琼(1979—),女,湖北利川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格,抨击了孝道只有对孝子义务的制约,而没有对与孝思想对应的父之不慈的制裁。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施存统在他家庭生活中体会到做孝子的艰难,他亲眼目睹父亲对母亲的冷漠与无情,陷入孝与非孝的两难处境:顺父逆母,不孝;帮母斗父,亦不孝。于是他在1919年《浙江新潮》上愤而发表了《非孝》的文章,批判“传统的孝是一种不自然的、单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6]。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批判孝文化的序幕,鲁迅、郁达夫等现代小说作家对孝文化的腐朽与落后大加讨伐,其中鲁迅是批判孝文化最激烈的作家。他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传统孝道“长者本位”的观点,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孝文化的父权。在《二十四孝图》《肥皂》等作品里更是对封建孝文化的虚伪性进行了严厉批判,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孝道吃人的本质。鲁迅全面批判了封建孝道,让几千年来一向如此的封建孝道成为众矢之的。郁达夫在他自叙传的小说作品中,零余者大胆袒露病态、畸形的性心理就是从另一个层面发起对孝文化的挑战。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作家激烈批判传统孝道的专制、腐朽,然而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难以摆脱孝文化的束缚,往往无法割裂亲情而牺牲自我来成全孝道,所以他们在精神层面和行为方式上经常会有孝与非孝两种力量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了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

现代小说作家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最突出表现在关系个人命运的婚姻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婚姻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子女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必须“无违而从”。现代小说作家在民主、自由等西学思想影响下渴望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他们也在作品中表达了这种诉求。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为了自由恋爱敢于离家出走,郁达夫的《茑萝行》中主张自由婚姻,直接批判父母是婚姻的作孽者。彭家煌在《节妇》中揭露了母亲为一己之私用金钱交换女儿的前程:“阿银的妈在冻饿中本只想将阿银卖上四五元好救救自己和怀里的孩子,好几天也无人过问,而候补道人却肯以八元慷慨的收买了去。”^[7]现代小说作家对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专制行为进行了强烈地揭露与批判,然而这些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也如他们作品中的不幸人们一样成为孝道思想下的牺牲品。比如鲁迅虽然是反封建孝道的急先锋,但他本人却无法摆脱母亲定下的包办婚姻。在鲁迅的思想里,我们明显看出矛盾性:一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强烈批判孝道,另一方面鲁迅自己无法摆脱封建孝道的束缚,屈服于“父母之命”婚约,在

母亲“以死相逼”的婚姻面前,他为了“迎合母意”而陷入婚姻悲剧中。鲁迅在封建孝道中言与行的矛盾正是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的体现,表现了跨越新旧文化两个时期的现代小说作家与孝难以割舍的脐带关系。创作社的小说作家郁达夫起初对母亲的包办婚姻是坚决抗拒的,最后在祖母、母亲的百般催促下不得已答应了包办婚姻。鲁迅和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在奉行母命的同时实际上给自己和妻子造成了更大的不幸,比如鲁迅与朱安、郁达夫与孙荃受困无望无爱的婚姻,这样遵守孝道带来的悲剧性更加激发他们抨击传统孝道,甚至有的小说作家对传统孝道进行了偏激的否定与批判,这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切体会到传统孝道造成的悲剧命运密切相关。

现代小说作家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身处中西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态。他们在理智上接受并认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而且也以此为思想武器对传统孝道展开揭露与批判,他们出洋留学更是切身体会到资产阶级文化相比专制的封建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在文化人格上也逐渐由传统文化人格转向现代文化人格。他们的行为方式受传统文化人格与现代文化人格的交互影响,当两者发生冲突矛盾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人格就会对行为方式产生制约作用。这些作家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跨越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们与孝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在“西学为用”的层面上进行选择,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下极力反抗孝道,揭露封建孝道的腐朽性、专制性、虚伪性。然而当他们自身置于孝文化矛盾中时几乎都难以突破孝道的桎梏。“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而渗透到人的深层理性之内,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一种习惯心理,这就是无意识的文化心理,或曰‘集体无意识’”^[8]。孝文化人格已经深入到现代小说作家的深层意识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心理,作为先在的或者潜在的孝文化思想仍然延续着,其落后腐朽的思想一时难以根除,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的思想规范。傅斯年曾说:“我们自以为是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但惭愧的是,新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因为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9]林毓生曾评价鲁迅全盘性或整体的反传统时,说他的意识之中存有深重的思想矛盾与精神上的紧张。这种思想矛盾与精神上的紧张其实就是现代小说作家批判孝文化的普遍矛盾心态。他们在童年及少年时期深受孝文化的影响,青

年时期走出国门所接受的西学促使他们审视传统文化,从而在孝与非孝之间形成矛盾的人格取向。鲁迅、郁达夫等现代小说作家都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并历经西学浸染,但心态上依然摆脱不了传统孝道的纠缠,当现实与传统孝道相冲突时,就表现出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他们与孝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他们在小说作品中强烈批判传统孝道的腐朽、专制,甚至为了启迪民智一度表现出文化激进与偏激的姿态,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当面对无违母命与坚守自我时,他们却无法突破文化人格上道德与情感的困境。因此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作家在精神层面上对传统孝道进行激烈批判,但由于人伦亲情的干扰,始终陷于亲情与道德困境中难以自拔,形成了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

现代小说作家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的形成与所在的家庭环境紧密相关。鲁迅、郁达夫、罗家伦、王统照、彭家煌等等都出生在封建没落家庭里,有的作家如鲁迅、王统照、郁达夫等都是在寡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中长大。他们陷入情孝冲突的矛盾并不是因为孝文化的压迫,也没有强大的家族力量逼迫着他们牺牲自我做孝子,他们是迫于寡母抚育的不易以及对慈母的爱而接受母亲的婚姻安排,这完全有别于古代孝子的孝行。古代孝子在孝文化侵染中长大,孝子规范早已深入到他们潜意识里,他们认为在封建等级制度下遵守孝道本应如此。现代小说作家在情孝冲突中遵从孝道的“无违”思想与古代孝子是相同的,然而他们在守孝的同时已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的“无为而从”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我牺牲。他们是封建孝文化最后的守灵人,这种孝与非孝的清醒意识与矛盾行为与传统孝子“本应如此”截然不同,这就是现代小说作家情孝冲突双重人格的独特体现。

二 非孝意识下的叛逆人格

现代小说作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形成了另一种孝文化人格——非孝意识下的叛逆人格。中国传统孝道具有双重性,既包含人伦亲情的孝道,又包含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而来的专制孝道。非孝意识并不是全然否定孝思想,现代小说作家非孝意识否定的是专制异化的孝思想。这种否定并不仅仅局限在孝思想批判上,还体现在现实行动上真正迈出了非孝的脚步,既在思想上激烈批判,又在行动上坚决抵制,达到非孝思想与行为方式的一致。作为文化先驱的现代小说作家他们往往受传统文化人格的限制而不具有真正的非孝意识,而在五四思想影响下成长起

来的现代小说作家大多是在新学中启蒙,传统文化人格也表现在他们行为模式与内在的心理特征上,只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已与五四时期小说作家截然有别。他们根据社会的变革与文化革新不断调整传统文化人格,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在非孝时不以顺从父母之命牺牲自我来践行孝道,其非孝意识里已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诉求,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这时期的小说作家基本上是在五四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比如巴金在五四时期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思想刊物,这使他从四书五经的旧式教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激起了反抗传统向往自由的渴望。巴金曾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10]老舍接受的教育和贫穷的家庭环境使他受传统孝文化束缚较少,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封建思想也深深影响了老舍,他在《“五四”给了我什么》文章中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作礼教的奴隶”^[11]。五四反传统思想为巴金、老舍等现代小说作家非孝的叛逆人格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西学思想和五四反传统的双重影响下,这时期的小说作家反抗封建孝道的思想与行为比五四作家更加激进,他们非孝时甚至毫不留情地斩断了伦理亲情孝道,而这恰恰是五四小说作家无法超越的心理矛盾。萧红的父亲是一位十足的封建家长,当父亲中断她的学业强迫她嫁人时她以离家出走向父权挑战,甚至断绝父女关系。五四宣扬的民主、个性解放思想为萧红反抗父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她叛孝的同时毫无留恋地斩断了亲情伦理孝道,一辈子都无法原谅父亲,成了彻底的不孝子。可见五四思想影响下的小说作家在反叛孝思想上更加坚决果断,他们在五四思想影响下加入到反封建的阵营,甚至五四时期的小说作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如鲁迅对巴金、萧红等作家的影响。

开明的父母也是这时期小说作家形成非孝叛逆人格的重要原因。茅盾出生于开明的商贩家庭,父亲是维新知识分子,喜欢声光化电新学、数学、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不仅如此,父亲也让茅盾从小就接触了新学如《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父亲去世后,母亲继承丈夫遗志,继续让儿子广泛接触西学,带领儿子阅读《西洋通史》《东阳史要》以及林译小说,这些新知识无疑开阔了茅盾眼界。茅盾与鲁迅、郁达夫、胡适、郭沫若等作家先旧学再西学的教育路径完全不同,茅盾国学西学并进的教育路径使他能够理性地审视传统文化,能在孝与非孝之间

进行折中调和,既能顺从母命,也能达成自己的心愿。矛盾的孝行为架起了孝与非孝的中间桥梁,避免了守孝的悲剧和非孝的极端方式,达到了孝与非孝的矛盾调和的理想状态。

同样,中国现代小说作家非孝意识下的叛逆人格最突出的表现也是在具有个人隐秘意义的婚姻上,主要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顺从父母之命,既对父母尽孝也力求达成自己的心愿。比如茅盾面对父母年幼时定下的娃娃亲,内心十分矛盾,自己是新派青年,不愿向旧式包办婚姻低头,而母亲为人善良,又不想为难母亲,同样陷入情孝冲突的矛盾中,但是茅盾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胡适等五四作家接受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不一样,茅盾权衡中做了折中的选择,向母亲提出要求,要求女方放开裹脚布,并请求母亲教她读书习字,从而让女子接受新学变为新式女子才同意婚事。二是反抗父命离家出走的叛逆人格。这种彻底叛孝的作家自身就出生在封建孝文化毒害的大家庭,亲历封建大家庭专制孝道下的种种悲剧。当封建孝道危及自己及亲人时,他们坚决地反抗专制孝道,以离家出走甚至断绝父子关系来捍卫自由人格的尊严,从而成为封建孝文化的真正掘墓人。现代小说作家老舍、巴金、张爱玲、萧红以及丁玲都曾用激进的方式反抗父母之命。巴金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他从小就不满爷爷的权威,也讨厌乌烟瘴气的大家庭生活而离家出走。张爱玲出生于封建没落贵族家庭,因反抗继母被父亲关禁闭,设法逃出父亲的禁锢后一辈子也没原谅父亲,更不用说践行善事父母或者“用孝养阙父母”的孝行了。丁玲父亲早逝,与舅舅生活在一起,她反抗舅舅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甚至登报与他断绝亲情关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说“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12]。巴金、张爱玲、丁玲、萧红等作家面对父辈的过错与喜好选择果断抗拒,显然违背了封建孝道的礼法规范。老舍反叛孝道不像张爱玲、萧红那样斩断亲情离家出走,也不像茅盾那样能够在孝与非孝之间折中,调和无违顺从与坚守自我的矛盾,老舍在为自己争取婚姻自由时敢于冲破孝道思想的“无违”和“父母之命”,甚至威胁母亲:“您要再提这件事,我就不再养活您了!”^[13]^[24]《礼记·祭统》中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其三道,孝子之行也。”^[14]老舍的非孝行为显然违背了“生则养,养则观其顺”的孝道思想。老舍的非孝行为给母亲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他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有时候不

敢面对她。可见现代小说作家在反抗封建孝道上也历经艰难与挣扎,即使老舍、巴金挣脱封建孝道的束缚,但他们心里并没有叛孝后的轻松与自在。

传统孝道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情感与道德规范,由原初的祖先崇拜发展到亲亲之情,随着以孝治国与孝道伦理规范化后,传统孝道就异化为专制工具,从而孝道就具有了亲情伦理的孝道与腐朽异化的专制孝道的双重性。几千年来封建孝道已经被泛化为无所不包的专制思想。高元《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中认为:“伦常主义常道,‘圣人以孝治天下’;又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细读这两句话,就可知伦常主义和专制息息相关了。”^[15]现代小说作家几乎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强烈批判封建孝道的专制与腐朽,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无法调和封建孝道异化的矛盾。如果奉行封建孝道的“无违”思想又与自己认同的民主、自由的西学思想背道而驰;如果坚持自我又会违背父母之命,违背几千年奉行的孝道规范,这就是传统孝道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矛盾显现。由于传统孝道的双重性,即使能够理性地选择孝与非孝,但是真正看到因自己拂逆带给父母的伤痛时,他们又会感到心灵的痛苦与挣扎。老舍在争取婚姻自由,看到母亲因自己退婚失魂落魄的时候于心不忍,心生内疚,巴金逃出成都的大家庭后也时常想念亲人。其实,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小说作家,还是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作家,他们在生活中都是真正的孝子,鲁迅在北京立足后马上把远在绍兴的母亲接到北京,后来与周作人决裂,困境中仍然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尽孝,最后在上海还买张恨水的小说寄给母亲闲时阅读。老舍因远走英国无法对母亲尽孝,托付朋友“常来看看老母亲,和老太太聊聊天,唠唠家常,给她些安慰”^[13]^[40]。可见现代小说作家在孝与非孝中遵守而笃行传统孝道养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孝文化符合人性的永恒价值。

现代小说作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得不面对两种文化场域:一个是中西文化冲突形成的文化场域;二是他们面对的民族、国家命运而形成的文化场域。这两个文化场域空间的并存影响着现代小说作家对文化、政治、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并在想象与建构中形成了不同的孝文化人格——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和非孝意识下的叛逆人格,这两种孝文化人格都激烈批判传统孝文化,同时在激烈批判的背后他们与孝却有着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批判中的复杂思想是受传统孝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影响使然。

[参考文献]

- [1] 陈红. 人格与文化[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 [2] 黄建华. 中国孝文化教育研究[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10.
- [3]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307.
- [4] 郑雪. 人格心理学[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5.
- [5] 邓星盈. 吴虞思想研究[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82.
- [6] 施复亮. 五四在杭州[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755.
- [7] 黄勇.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彭家煌(下). [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251.
- [8] 龙泉明.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7.
- [9] 孟真. 随感录·中国狗和中国人[N]. 新青年,1919-11-06.
- [10] 王金柱. 语言艺术大师巴金[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9.
- [11] 谢昭新. 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 学术界,2019(5):35-41.
- [12] 万本根. 中华孝道文化[M]. 成都:巴蜀书社,2001:47.
- [13] 舒乙. 老舍正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 [14] 马新. 论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异化[J]. 孔子研究,2004(7):47-54;127-128.
- [15] 高元. 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J]. 新潮,1919,2(2):133.

Filial Piety Culture Personality of Modern Chinese Novelists

HU Yong-qi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Filial pie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anti-traditional move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filial piety culture became the first critical object, among which there was radical neg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thoughts such as science and democracy advocated b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Chinese modern novelists can't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are often two kinds of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spiritual level and the actual behavior, which affect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form different cultural personalities.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ontains not only filial piety of kinship, but also filial piety of maintaining feudal autocracy. The complexity of cultur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al choice also affect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modern Chinese novelists.

Key words: filial piety culture; novelist; filial piety contradiction; non-filial consciousness

(本文编辑:魏月华)